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空缺主體」與「陰性情境」：重探台灣後殖民論述的幾個面向

The Feminine Situation and the Subject qua Void: Rethinking Taiwan's Postcolonial Discourse

doi:10.6752/JCS.200906_(9).0001

文化研究, (9), 2009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9), 2009

作者/Author：張君玫(Chun-Mei Chuang)

頁數/Page：5-4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9/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906_\(9\).0001](http://dx.doi.org/10.6752/JCS.200906_(9).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The Feminine Situation and the Subject qua Void:
Rethinking Taiwan's Postcolonial Discourse

Chun-Mei Chuang

「空缺主體」與「陰性情境」：
重探台灣後殖民論述的幾個面向

張君玫

這篇文章歷經了漫長的旅程與多次大幅修改。最初版本〈在台灣思考一個後殖民的女性主體：從「再現」到「闡連」〉發表於2006年9月台灣女性學學會主辦的「性別表徵與權力關係研討會」。稍後2007年6月以“A Politics of Writing as Articulation: Rethinking Taiwanese postcolonial discourse”為名發表於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和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等單位合辦的“Conditions of Knowledg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Shanghai Conference”，June 15-17, Shanghai University。這篇文章最後的成形與出版必須感謝兩次研討會發表時的所有評論意見。《文化研究》期刊多位匿名審查人與編輯委員不吝給予許多中肯的批判和具體的修改建議，提供更多思考機會，讓我獲益良多，在此衷心感謝。在不斷反芻思考與修改的過程中，論述線索得以更加清晰明白，體會到思想有機的生長過程。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電子信箱：meisland@gmail.com

airiti

摘要

自從1990年代幾場關於台灣後殖民性的激辯，「後殖民」已成為台灣文學批判與史論的重要部分。然而，關於台灣後殖民主體性的深入討論，卻往往因政治立場而中斷。本文擬從幾個面向重探台灣的後殖民論述場域。首先，我將檢視相關論述中頻見的「女性喻說」，並從身體現象學的取向進一步釐清身體/土地的物質性與能動力，以期理解台灣後殖民主體性的「陰性情境」。接著，我將重訪邱貴芬、廖朝陽和廖咸浩等學者在十多年前的辯論，接續他們的腳步，追索若干關鍵的爭議點，尤其是關於「主體位置」、「空白主體」與「主體化」等概念之間的複雜動態。最後，我將試圖以「陰性情境」和「空缺主體」之間的相互關連來理解台灣的主體性空間，以及如何在關於認同建構的文化研究中重新置入土地與肉身的物質性思考。

關鍵詞： 空缺主體、陰性情境、後殖民、多重關連、物質性

Abstract

This essay aims to rethink Taiwan's postcolonial discours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I look into the abundant feminine tropes in Taiwan's postcolonial discourse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feminine situation of Taiwan as a postcolonial subjectivity. Secondly, drawing on the contemporary phenomenology of body, I explore the horizon of the agency and materiality of the body and the land. Thirdly, I revisit the postcolonial debates more than a decade ago among Kuei-Fei Chiu, Chao-Yang Liao, and Hsien-Hao Liao, in order to re-articulate the complicated dynamic relationship among "subject", "subject position", "subjectivization" and "subject qua the void." In the conclusion, I suggest a co-articulation of the "feminine situation" and the "subject qua void" to understand the space of Taiwan's postcolonial subjectivity.

Keywords: subject qua void, feminine situation, the postcolonial, multiple articulations, materiality

一、「台灣」這個地方、主體空間與物質情境

在這篇文章裡，我想重探台灣十幾年前展露的後殖民論述場域，以若干相關的論述和辯論做為引子，進一步開展「主體位置」與「空白主體」等相關概念，並提出「陰性情境」的看法以便在認同建構的文化研究中重新置入物質性的動態探討。

檢視台灣的後殖民論述場域，「台灣」做為一個主體性，呈現出一個以各種不同方式在扣連「人」、「語言」、「地方」及其它諸多要素的闡連場所(the site of articulations)，而不只是狹義地「再現」被殖民者（與被壓迫者／被排除者）。更精確而言，在種種尋求「再現」的主體化努力中，我們發現，倘若沒有動態的闡連勞動、隱喻作用、意義商榷與文化翻譯，環繞著不同的優位意符(privileged signifier)去編織論述，就不可能形成任何「再現」，無論被再現的是「女人」、「本省人」、「外省人」，或「台灣人」。以政治理論家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穆芙(Chantal Mouffe)的話來說，就是論述中的「節點」(nodal points)，亦即特定的意符或論述點，藉此將一個表意鍊(signifying chain)的意義加以部分地固定。(Laclau and Mouffe 1985: 112)那些在戰鬥中被用做賭注的字詞，那些曖昧的場所，包括「台灣」、「主體」、「台灣主體」、「女性意識」和「身體」等都可能在不同論述情境中成為優位意符。這也是本文在重探台灣後殖民論述的幾個面向時所意欲關注的課題。

除了論述重探之外，本文也將在理論上嘗試於建構、闡連、偶成與流動等過程中重新置入對於身體、土地、物質性、情境性的動態思考。這樣的思考主要是借助女性主義身體現象學的理论觀點，以期在鋪陳主體位置與論述空間的同時，避免把歷史與身體的情境全部化約到語言的符象層次而落入壓倒性的建構論傾向。

(一)「台灣性」和「女性」的接合與斷裂

早在1992年，邱貴芬和廖朝陽就曾針對「台灣後殖民論述」的可能性與「台灣文化」的屬性與內涵進行辯論。自從1995到1996年《中

外文學》一場關於台灣「後殖民性」與「後現代性」的辯論，「後殖民」更已成為文學批判的基本切入點。劉紀蕙(2000)將此稱為《中外文學》的「本土轉向」。

一方面，在女性文本（尤其是小說）的書寫與詮釋上，許多討論往往環繞著「女性主體」和「國族建構」之間的衝突與合作，尤其是關於女性情欲的「再現」問題。透過此類「女性化」、「情欲化」與「感官化」的性別再現，來揭露或顛覆國族主義與男性中心主義之間的共謀以及偏頗的男性台灣史觀與小說論，比如張京媛編(1995)、邱貴芬(1997)、馮品佳(2000)、梅家玲編(2000)、梅家玲(2004)、劉亮雅(2006)等；朱偉誠(1998, 2004)則從後殖民的觀點去探討「同志現身」的問題。

另一方面，在「台灣主體性」的後殖民討論中，經常可以在「台灣性」和「女性」之間找到某種奧妙的概念相通和 / 或喻說接合。女性化的民族喻說是常見的修辭，並經常出現對「女性主義」的挪用（尤其是對僵固「認同」的批判）。（廖朝陽 1995a）「女人」(woman)和「台灣」(Taiwan)同為「被壓迫者」的弔詭定位不時在辯論中浮現。

無論女性主義觀點的小說分析，或「台灣主體性」構成的激辯，都凸顯了「台灣」的定位乃是一個意義鬥爭的場所——不管爭戰的是「台灣」做為一個地方（本土、鄉土、土地）的混雜意義與未決地位，或是「台灣」做為一個「大寫主體」(Subject)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關於台灣後殖民情境的特殊性，尤其「台灣性」的內涵，始終是意見紛歧。「台灣性」做為一種後殖民主體性是否有任何具體的性質？如果有，又是如何取得或構成的？「台灣性」是一種對立於「中國性」、「日本性」或其它國族性的相對詞語？抑或在其建構的可能性當中包含了某種不因參考架構而更動的基質？

在台灣的后殖民論述場域中，可以找到許多關於「主體」(subject)與「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的討論——正是在這些討論裡，特別呈現出後殖民與女性之間的實質與喻說關係。比較沒有看到

的是關於「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探討——無論是暫時定格的主體性內涵，或是動態演化的主體化(subjectivization)過程。而這些討論的傾向皆與建構論的抬頭有著密切的關連。

(二)「女性」做為認同的中介與地方

在當代小說的女性主義分析中，「台灣」（這塊土地、這個地方、這個家）的女性化喻說一再被強調。比如，范銘如運用「女性身分地理(geography of identity)」的概念來理解女性作家的人物刻劃，並將女性主體的「身分位置」扣連到「台灣這個地方」的想像。范銘如指出，在1950年代的女性小說裡，當時迫遷來台的外省籍女性往往視台灣為一個新生地。女人到了「異鄉」或「新故鄉」，反而得以重獲新生。女性小說家在思考「台灣這個地方」的意義時，也往往「將台灣女性化」，於是，「台灣成為一個女性空間的隱喻」，被賦予「重生、爭女權、擺脫封建」等積極的意義。（梅家玲編 2000：45、47、49、59、72）

同樣地，梅家玲指出台灣在反共文學中乃是一個「重生之地」，尤其對女人而言。（梅家玲 2004：77）對外省男性來說，有幸和溫柔的台灣女子結為連理等同於在異地重生。（梅家玲 2004：87-88）在此一對土地的想像中，「台灣」乃是一個女性化的溫暖所在。相形之下，「台灣男人」（指「福佬男人」）卻往往在這個圖像中被污名化。比如，梅家玲在探討舒亞雲的小說〈母親的故事〉時，指出其中複雜的夫妻與親子關係宛如一則性別與省籍交錯的「身分地理」寓言：大陸母親、大陸父親（好人、忠義、有情、國民黨）、台灣父親（壞人、漢奸、強暴犯、共產黨）、大陸子和台灣子（原為好友，後來因為殺父之仇差點反目成仇）。（梅家玲 2004：88-90）故事以二二八事件為歷史背景，刻板化的描寫難免暴露族群歧視，卻具體映照出當時的國民黨官方意識型態：「大陸母親」的苦難與包容彰顯了兩岸的血濃於水，而親日的台灣父親正是日帝殖民主義的遺毒，終免不了被代表正義的外省父親所誤殺。這似乎也映照出台灣在擺脫日本統治之後的尷尬處境：「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失衡並進。

台灣戰後結束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地身分，由迫遷來台的中

國國民黨接管，並帶來一批非自願的新移民，形成特殊的「外省人」vs.「本省人」（指早先來台的漢人）的族群對立形態。還來不及以自覺的「本土」意識進行對日本統治的「去殖民化」工程，原先在地的漢人立刻因為對照於新一波漢人移民而成爲「本省人」，並面對教育、文化與政治政策的「中國化」。「中國」的意義發生分裂與轉化，一方面台灣成爲所謂的「自由中國」，另一方面，「中國」由情感上的「原鄉」轉變成政治上的「敵人」與文化上的「正統」。中國，一個充滿內在矛盾與張力的意符。省籍問題因此被架構成台灣後殖民問題意識的主軸，然而，正如陳光興所指出的，台灣也因此未能「運轉去殖民全面性反思」。（陳光興 2006：86）或許，「全面性」反思的不可能就如同「社會」的虛構與動態——「由於『社會』乃是不可能的，所謂社會的**就是一種闡連。**」（Laclau and Mouffe 1985: 114）——正是因爲對立的架構永遠難以消失，總是持續換置。「本省」/「外省」的二元對立總是輕易被翻譯成統獨對立，成爲思考「台灣主體性」的框架，從而排除更細緻複雜的思考。

「台灣女人」和「大陸母親」這兩個女性形象扮演了不同的喻說性格，卻都具有「救贖」的色彩——對身陷國族情仇的男人來說，「台灣女人」或「台灣」做爲女性，是男性國族爭奪的交換物。對某些人來說，「大陸母親」是終結分裂的溫暖懷抱，對另一些人來說，「台灣母親」才是孕育新生命的所在。梅家玲分析眷村文學時提到，對外省男性來說，和溫柔的台灣女子結婚是重生的機會。而陳光興在分析楊照的小說時，則提到「本省男人」往往透過（擁占）「外省女人」來得到「外省人」的認同，「以便清除自卑的被殖民焦慮，從而認同『外省男人』過去的優勢位置」（陳光興 2006：65）。在此，「外省女」似乎成爲「本省男」與「外省男」在國族主義同性愛欲中的結合媒介。就像魯賓(Gayle Rubin)所言，在兩個進行交換、結盟或競爭的男性群體之間，女人乃是被交換的客體，只能是「被給出」的客體，而不能成爲「給出」的主體。（Rubin 1975: 37）陳光興分析中所呈現的交換系統恰好和梅家玲的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外省男從本省女那邊找到「溫柔」（那原本只保留給本省男的土地/身體），而

本省男從外省女那邊重拾「尊嚴」（那原本只屬外省男的優越感／權力）。在「溫柔」與「尊嚴」之間，女性意符看似多樣，卻都被限定在男性主體意識的滋養中。倘若再對照於邱貴芬所言，在「殖民高壓統治下，福佬女性往往眼見自己生命中有親密關係的男人（父親、丈夫、兒子、愛人）被象徵性去勢」（邱貴芬 2000：135），就不難梳理出幾種迥異的詮釋立場。

邱貴芬所說的「男人」並未言明省籍，卻已然預設「福佬女人」的男人當然就是「福佬男人」，亦即陳光興筆下自卑的「本省男人」。邱貴芬說：

重塑台灣男人的尊嚴也因此成為福佬女性擺脫歷史記憶負擔的手段，介入她性別關係的建構。（邱貴芬 2000：135）

問題是，引文的「台灣男人」是誰呢？只能是「本省男」嗎？抑或是所有「認同台灣的男人」？或「擁有『台灣』（這個女性化所在物）的男人」？那麼，「台灣女人」本身的尊嚴或認同呢？而那些欲望「外省男」的「本省女」呢？她也是在欲望那種屬於「外省」的優越性／感嗎？她以「溫柔」所交換或滋養的又是什麼？她的性別關係呈現怎樣的圖像？這些問題或許不是那麼容易直接回答。在後殖民的文獻中，這不免把我們帶回到法農(Frantz Fanon)著名的「有色女與白男」和「有色男與白女」之戀，以及女性主義對法農性別盲點的批判。（法農 2005：105-151；張小虹 1995）然而，比起「白」和「黑」之間的鮮明對立，「外省」和「本省」的層級化對立就某方面來說卻可能更加錯綜複雜，表面上不似黑白對比那麼徹底，卻在「同文同種」的預設內劃出難以跨越的鴻溝。

可以確定的是，要重新描繪省籍與族群的欲望地圖，我們需要更複雜迂迴的概念架構，正如許多後殖民理論家，例如巴巴(Homi Bhabha)所指出的，至少必須超越「殖民」與「被殖民」的二元架構。如何打破或轉化「女人」做為中介與交換物的物質—象徵隱喻和處境？這個問題當然涉及了多重的層次，既不僅是心理的，也不僅是台灣的特定情境，而是所有父系與全球資本主義體制所共有。主體性的暫時定格，亦即認同，做為一個闡連的場所，本身乃是一個可能性

的受限空間，取決於多重的關連實踐和生存鬥爭。透過本節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從所謂「女性觀點」去重新進行再現，也就是環繞著不同的優位意符去實踐關連的論述勞動，從而揭露國族想像中未被檢驗的預設。

（三）思考台灣土地的陰性意涵

陳芳明在講述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觀時指出：

台灣人的人格形成，絕對是在這塊土地上形塑出來的。沒有這樣的土地，就沒有台灣的鄉土想像，更不會有自己的文學想像。（陳芳明 2002：53）

「土地」的物質性包括了土壤、氣溫、動物、植物、高山、海洋，乃至於區域鄰近的整體環境，以及曾經與正在發生的人文景觀與歷史點滴。以台灣開放的「海洋文化」來對抗所謂封閉的大陸文化，因此也成為早期黨外運動重要的文化論述。

邱貴芬在探討《桂花巷》、《迷園》、《泥河》等當代女性小說中的「女性化鄉土經驗」（邱貴芬 2000：124-136）時，強調「土地在國家敘述與身分認同建構過程所扮演的吃重角色」（邱貴芬 2000：122）。土地經常被賦予一種**女性化或陰性意涵**。女性作家所呈現的鄉土意象往往迥異於男性國族論述，並藉此揭露了男性鄉土觀，後者在將「土地」視為召喚國族想像的重要象徵時，往往也代表了一種家國暴力。亦即，男性鄉土觀雖是打造國族意識的重要成分，卻也造成某種**固著化的排他效應**。反之，《迷園》這樣的都會「女性鄉土小說」，賦予鄉土一種流動的意義，讓我們得以擺脫僵固的「鄉土戀物情結」（邱貴芬 2000：137），從而反省身分認同建構的文化想像空間。

邱貴芬刻劃的土地觀是男女有別的：男性的土地觀僵固而排他，女性的土地觀流動而包納。然而，她並未進一步探討其中緣由。只因爲女性意識比較流動嗎？可以探問的是，這樣的差異有沒有可能是因爲人們在對「土地」的思考中始終預設了某種陰性特質？男女有別的土地觀是否其實反映了兩性對於陰性土地的不同**關係**（而非僅是想像或觀念），前者是對她者的占有，後者則是自我流動的期許？

值得深究的是，當邱貴芬試圖重新定義「地方」(place)，似乎過猶不及地把「地方」加以中立化，似近於一種抽離歷史特定性的「空間」(space)。邱貴芬引用當代人文地理學家瑪西(Doreen Massey)的理論，指出我們應該：

摒棄傳統視地方(place)為一個地理定點，具有單一、特定身分認同的地理區域。一個地方並沒有固定的歷史意義，反而是一塊上面生活著利益衝突的不同社群的土地。……「土地」想像可以是以介入的姿態，探討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社群關係，想像不同勢力如何爭奪詮釋、界定這個地理領域主要指涉意義的活動。……地理名詞之為一個意義流動的符號……不同勢力折衝互動過程的活動。(邱貴芬 2000: 123)

邱貴芬所提出的「土地」概念固然可以擺脫本質化的土地想像，觀照歷史與地理的意義交織，從而掙脫對土地與女性的物化陷阱，卻因過於關注命名與詮釋權爭奪，致使「地方」(place)和「空間」(space)之間原本就模糊的界線更加混雜。在理解一個地方做為空間的「意義」時，我們固然必須嚴肅看待語言和空間之間的類比性，卻不宜全然取消地方的物質性，否則雖然逃脫了邱貴芬所批判的「鄉土戀物情結」，但不免陷入新馬克思主義空間學者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批判的空間形式主義，一種「對字詞的狂熱崇拜」(cult of words)(Lefebvre 1991: 131)。

這種對命名與詮釋權的過度強調相當程度體現了土地觀的詮釋學轉向，同時也展現了建構論的思潮。以廣義的歷史論述性而言，土地、生命、身體、肉身確實在特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建構出來的」(constructed)。然而，過分強調符號的層次和指義的活動，往往等同於提早放棄探討建構的前提、可能性與動態過程。

誠如紀傑克(Slavoj Žižek)所言，徹底的社會建構論者陷入了形式主義的陷阱，因為他們嚴禁探問：歷史性的空間本身(the very space of historicity)——那包含了符象化的眾多偶成模式(the multitude of contingent modes of symbolization)的空間——是如何自我維持的？(Žižek 1999a: 279)換言之，為什麼那不斷被重覆展演並維持下來成為中心是「這個」模式，而不是「那個」模式？文化偶成性的物質基礎

在哪裡？弗斯(Diana Fuss)在拆解女性主義理論中的「本質」與「建構」的二元論時也指出，任何激進的建構論都必然立基於某種隱藏的本質主義(Fuss 1989: 12)，無論那個「本質」是語言、文化或歷史。換言之，社會建構論本身，推到極點，也難免落入某種「社會本質論」(social essentialism)。

於是，揮之不去的動盪，一端是「建構」與「偶成」，另一端是「本質」與「普遍」。我們所能安身立命的，是中介狀態裡的多重關連與翻譯實踐，不斷重新尋找定位的節點、場域或核心。

二、土地與身體共通的陰性情境性

土地和身體一樣，固然沒有絕對的「本質」，卻有一定程度的物質特定性(material specificities)，包括氣候、地理、文化、歷史、人群關係等諸多面向的特定性，一種情境性的限制。這些物質特定性本身並非靜態或固著的，而交織著特定傾向的動態過程。關鍵因此在於情境性(situatedness)的多重意含與多樣化作用。由於土地和身體（尤其是女體）之間往往構成某種喻說的關連關係，以下我想透過討論身體的情境意義，來釐清土地與身體共通的陰性情境性。

（一）身體情境：在限制與自由之間的動向

當代身體現象學指出，對於意識來說，身體形同一個物質情境。一個身體讓「持有」和/或「居於」此一身體的意識與自我成為可能，但也同時局限著意識的視界與自由。如果一切的意識都是感知的，那麼一切的意識也必然是身體的，自我因此總是一個身體的自我(a bodily ego)，而存在總是一個體現的存在(embodied existence)。儘管身體並不能決定或代表我們和世界（與他者）之間的關係，卻體現或表達了這些多重而或有矛盾的關係，並且從中可以促成改變。我們不僅活在特定而有限的身體情境裡，也唯有在特定而有限的物質社會情境中活出這個身體。因此，當代影響深遠的身體現象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說：

身體是我們得以擁有一個世界裡的一般媒介(*general medium*)。有時候它僅限於維繫生命的必要行動，藉此為我們設置了一個生理世界；在其他時候，透過充分發揮這些初級行動，並從它們的表面意義延伸到一種塑型的意義(*a figurative meaning*)，身體在這些行動中展現了一個饒富嶄新含意的核心：這也適用於肢體活動的習慣，比如跳舞。最後，有時候，當目標所指向的意義無法透過身體的自然工具來達成，它就必須為自己構築一個新的工具，從而在周遭投射出一個文化世界。(Merleau-Ponty 1962: 146)

上述引文道出了身體的雙重性，一方面是匿名、無個性的「一般媒介」，另一方面又具有積極的能動力，可以適應、修正與改變周遭世界。身體是情境，是工具，也是載體，是肉身(*the flesh*)，也是圖像。身體為我們設置了(*posit*)外在世界，也為我們投射出(*project*)存在的計畫。做為一個匿名的媒介，我們透過身體得以被置入更大的現象場域中，亦即梅洛龐蒂所言的「世界的肉身」裡。透過身體的能動力與特殊能力，我們得以在場域中移動，與其他肉身擦身而過、彼此穿透，進行溝通或發生衝突，或重新劃定彼此的界線。因此，梅洛龐蒂也指出，「我」身為一個「主體」並不是以我為中心，而是「偏離自我中心的」(*ex-centric to myself*)。(Merleau-Ponty 1964: 123)換言之，我身為主體的核心並不在我之中，毋寧是有一個更寬大的世界肉身在穿越我，透過我去感知、去發生。唯有當回歸到我有能力去看、去感知的「身體」，感知的我才是一個體現的我。在此，一個身體的自我或自我的身體圖式不僅涉及身體與世界的關係，也關係到自我和他者的關係。或許就像許多論者包括女性主義者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指出的，在梅洛龐蒂的呈現中，「他者」被感知的方式依然太過匿名與一般，尤其是對女性他者來說，她似乎是「永遠無法被認識的」(*forever unknowable*)。(Irigaray 1984: 20)此處所涉及的，乃是一種在匿名一般性中不斷發生的差異化作用；性別化也在其中，而且是相當核心甚或最核心的一種。

然而，我們仍然不宜用主客二元的架構去框架梅洛龐蒂對世界與他性的思考，甚至連「自我」和「他者」的架構都並非充分恰當，而是搖搖欲墜，必要的權宜。身體做為情境，活生生的身體主體，和世界的肉身有著連續性的關係，一方面那是根植於既成歷史的，另一方

面也是動態持續構成的。在此我想強調的是，身體做為情境或處境的意義不僅是雙重的，決定或被決定的單向，或辯證的，而必須至少是三重的。首先，身體本身構成了一個情境(a situation)；其次，身體情境總是處於特定的情境之中(situated)；最後，身體情境可以展現具有移動、調整與修改其本身及更大情境的能動性，因此也是足以改動情境的(situating)。在這三重的情境交互動態中，一個特定身體與持居此一身體的意識及自我之間，呈現出動態的生命與歷史關係，既不是恣意的文化建構，也不是命定的物質決定論，並蘊藏某種持續逃逸於再現之外的動態。就某方面來說，這或許就像哈樂威(Donna Haraway)所強調的，知識與實踐乃是一種不斷在構成意義的物質—記號過程。(Haraway 1997: 190, 218)持續交織的知識建構與生命實踐，嚴格說起來，當然發生在所有存在著的人、事、物之中。然而，在女人的身體與意識上往往更加凸顯，因為在既存的社會歷史環境中，女性的自我往往比男性的自我更傾向並確實常被化約到狹義的身體，另一方面，女人的抵抗實踐卻也因此更加離不開身體的媒介與能力。

近年來不少女性主義論者開始重探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隱含但並未充分開展的女體觀念，尤其強調她和梅洛龐蒂之間的思想親近性，而不再視為只是沙特(Jean-Paul Sartre)存在主義的「應用」。(Kruks 2001; Heinämaa 2003)在此同時，對西蒙波娃的重探引發了女性主義哲學對梅洛龐蒂的興趣與詮釋，尤其是梅洛龐蒂無性別(預設為男性的)身體(asexual body)和女性主義所關心的女體特殊性之間的落差與關係。(Olkowski and Weiss 2006)基本上，西蒙波娃贊同梅洛龐蒂所言，「我是我的身體」(I am my body)(Merleau-Ponty 1962: 198; Beauvoir 1989 [1949]: 30n)，亦即，每個自我都是身體的自我，身體是某種意義下的「自然自我」(natural self)，但她也針對女人身處的特殊處境強調：

女人和男人一樣，是她的身體；但她的身體，是和她不一樣的東西(another thing)。(Beauvoir 1989 [1949]: 29)

女人身體的異己性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存在處境，由此延伸出女人對自身與世界的意識，並構成了我所言「陰性情境」的一部分。

當我們說「以現象學的觀點來說」，指的是以存在的現象框架與樣貌去看待事物，暫且不論本質是**什麼**。先去探討我們如何經驗著自己的身體，如何經驗著我們的存在與世界，以及我們的存在與世界之間的關係。就女人的身體經驗來說，女人更常把自己的身體視為自身主體以外的「另一個東西」。對於一切存在著的個體來說，存在處境的曖昧性在於，在受困與自由之間，總是存在某種無法消解的矛盾與張力。當上述引文說，女人「是她的身體」時，必須注意的是，此處的「是」並非關於本質的探問，但也不因此「只是」建構。在本質與建構之間二元對立框架中，一再逃脫、失落而無法抓取的很可能正是活生生身體 / 主體的經驗。

「經驗」(experience)這個一度被揚棄的哲學概念，在身體現象學的探問中再度受到重視。誠如克魯克斯(Sonia Kruks)在詮釋西蒙波娃時所指出，自由牽涉到一種實踐的主體性(practical subjectivity)，那是關於我們每個人在「世界」之中行動並推動自身存在計畫的可能性。(Kruks 2001: 35)每個人做為一個行動的主體與意識，同時也是一個活生生的身體。每個人無論是男人或女人，都因為活著肉身而承受物質情境的束縛，都必須去超越肉身情境的限制，去實現自己的存在計畫。但也正因為有肉身，才能夠以一個實踐主體之姿存在於世界之中。就像海尼瑪(Sara Heinämaa)指出的，西蒙波娃批判梅洛龐蒂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等男性哲學家在談到「身體的自我」與「世界之中的存在」時總是以男性經驗為基礎，因而太強調身體的工具性，甚至陷入某種非辯證性的物質觀。(Heinämaa 2003: 64)換言之，男性主體由於環境的優勢與種種因素，比較傾向於把自己的身體視為實現計畫的工具或限制自由的阻礙，而忽略身體同時表達了我們和世界之間的多重關係，這種關係既是實踐的，是想像的，是創造的，是重覆的，是情感的，也是情欲的。西蒙波娃的倫理學因此特別強調那在主動性與受動性之間永恆拉鋸無法消解的曖昧性，亦即她所說的「曖昧性的倫理學」(ethics of ambiguity)：「正因為人的情境是曖昧的，他才要去尋找，透過失敗和蠻橫，去拯救他的存在」(Beauvoir 1948: 129)。更重要的是，曖昧性的恆常情境正是動能生長、蓄積與開展的

airiti
所在。

身體既是牢籠，也是禮物。而土地，就如同國族的身體，既是國族主體性的情境限制，也是能動性所在。換言之，身體和土地都賦予我們一種有著情境局限性的能動力(situated agency)。就像在1980年代促使「所在的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一詞更加流通的里奇(Adrienne Rich, 1984)所言，生活在我們與生俱來及充滿歷史文化性的身體裡，不僅涉及到如何理解種種性別特定的器官和族裔有別的皮肤等，還牽涉到這個身體曾經或可以帶我們進入的地方。

在此我想強調的是，身體和地方之間的情境關連性，以及身體本身做為一個情境的特質與能力乃是密不可分的。透過身體多重的情境性，一個有著身體的主體方得以和一個或多個有著土地的地方接合扣連，以各種不同的可能方式。反過來說，一個地方在物質情境中的能動力也必須扣連到那些在此居住的身體的移動、定歇與關連活動。由此出發，或許可以找出另一個角度去理解瑪西在區分地方和空間時所指出的，地方做為一個過程乃是一個「被關連出來的時刻」(articulated moment) (Massey 1994: 115)。要探討一個特定地方的意義內涵，必然涉及社會行動者跨越時間與空間界線的實質活動，她們在既定物質條件與可能性中所進行的多重關連勞動。

(二) 「台灣」做為一個身體主體的陰性情境

梅洛龐蒂所說的肉身，既不是物質，也不是精神，而是存有的「要素」(element)；既不是事實，也不是事實的總合，卻附著在「所在地」(location)與「此時」(the now)。(Merleau-Ponty 1968: 145)換言之，肉身做為一個存有論的詞彙，指向了身體自我，也指向了歷史情境。這點可以扣連到我在上一小節所述，情境性的三重意義同時指向了身體自我與歷史情境之間的共構與動態，尤其強調身體、有身體的自我或身體情境主體做為行動媒介與關連據點的多重意義與可能性。從這些意義重新出發，我想回到第一節談及的台灣後殖民女性小說論場域，進一步鋪陳台灣做為一個身體主體的陰性情境。

在關於台灣做為一個「地方」的論述裡，土地與女體之間的相互

換喻不斷出現。如此女體化的土地觀是流動的，也是逃逸的，是受動的，也是抵抗的，是空缺的，也是未來的，溫柔美麗卻也可能捉摸不定，脆弱柔軟但也充滿危險與陷阱。總之，我們看到一個有別於國族主義陽剛氣質的陰柔土地，它在男性國族的論述中被物化、被占有、被撕裂、被割據，卻在女性小說的喻說中成為烏托邦、希望、救贖，或不確定的未來與可能性。這種性別化的差異不宜簡化為個別論述者的性別認同。毋寧說，「土地」做為一個地方或一個有著土地的地方往往被賦予一種陰性特質，男女有別的土地觀反映了兩性對於陰性土地的不同關係，一是男性自我對她者的占有與主權宣稱，一是女性自我投射出來的流動與開放延展。

台灣這個「地方」，首先仍是「土地」，一個有著土地的地方；恰如我們的自我乃是一個身體的自我(bodily self)。儘管以人文主義慣於貶低「自然」的偏見來看，土地的意義總是被輕忽或預設。正因為如此，當土地在國族論述中被塑造成一個陰性原鄉（相對於陽性國族），神聖但物化的女性象徵時，追求自主性（開放與出走）的女性意識總是抵抗著這種鄉土觀。然而，在抵抗這種對土地與女體的物化施為，並轉而強調文化的建構性和權力的爭奪之際，倘若因此徹底忽略土地與身體的偶成性與物質性，無異於漠視歷史與情境特定性對人類行動所構成的限制，更難以掌握此種限制同時授予的能力。而且不免造成另一種對陰性存在的否定。土地和女體做為一種陰性的存在，並不必然是物化的存在，而是如同身體現象學所言，在受限性與能力之間持續拉扯穿越的情境，永遠不是完全的自我，也不是完全的他者，而維持著一種對他者開放的倫理曖昧性。

透過以上小節關於身體與女體情境的現象學討論，更精確的說法是，土地和女體都以上述多重的情境意義**被經驗並體現**為一種陰性情境，而不只是「反映」或「再現」。陰性意指了幽暗的、承受的、情感的、紛亂的、隱匿的、陷溺的、情欲的、感官的、異己的，以及更重要地，差異化的，抵抗著匿名的統一性。就像身為一個性別化的身體主體，女性主體比男性主體更容易並經常感受到身體是一個異化於「自我」的東西，台灣的土地也在殖民與後殖民的經驗中被感受為某

種異化或異己的客體/母體，從而影響土地認同的性質。身體/土地做為異己的它性或她者，不一定要被吞併、消滅、占有或摒棄的，而是一個充滿未決曖昧性的能動空間，既是受動的情境，也是一個開展新領域的據點和媒介，聚積著並可能爆發抵抗的動能。

三、台灣的主體性安在？——「主體位置」和「空白主體」

在上節關於台灣做為一個地方的討論中，我們瞥見許多意象豐富的女性化喻說。而我也試圖指出，土地與女體所共同體現的乃是主體性空間之所以可能與受限的陰性情境。然而，由於台灣後殖民論述場域中壓倒性的建構論傾向，這種陰性情境所蘊含的多重意義與多樣作用往往被化約到命名與詮釋的狹義論述層次。在台灣做為一個認同的討論中，我們也看到類似的傾向。這充分展現在關於「主體位置」的辯論。本節將從《中外文學》在1990年代的幾次相關辯論入手，進一步探討台灣後殖民主體性的建構問題。

（一）「主體位置」與「空的立場」

1. 「台灣性」的跨文化性與體質

在〈「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一文中，邱貴芬主張，後殖民論述的核心意識可以說是一種「抵中心觀點」(de-centring)。(邱貴芬 1992a: 151) 儘管不少論者對「後現代」的台灣適用性有所疑慮，邱貴芬卻將所謂「後殖民」與「後現代」的觀點結合起來，因為兩者都是「抵制以對方為中心的觀點的論述」，以便「奪回主體位置」。(邱貴芬 1992a: 155) 邱貴芬強調「中心」與「抵中心」的拉鋸，比如「國語」和「台灣話」之間的競爭。這當然很容易陷入二元對立，她試圖以多元差異的「後現代」觀點來消解此一對立。然而，多元和二元之間存在著無法統一的矛盾。邱貴芬並沒有界定她所談的「主體位置」具有什麼內涵，很可能她並不認為「位置」需要任何固定或正面的內涵。稍後回應廖朝陽的批判時，她則提倡一種非本質化的主體概念，並引用相關的女性主義理論主張，無論

種族或性別的區隔主要都不是生物性的，而是「社會化的符號」：

這樣的看法有助於文化論者逃脫「本質決定論」(essentialism)而強調主體說話位置(subject-position)在抗爭行動時的重要性。置之台灣抵殖民架構，「台灣人」是一種說話主體採取的立場，而非本質。(邱貴芬 1992b：38)

這種徹底非本質化的主體建構論，有許多值得探討與商榷的空間。將「主體位置」等同於「主體說話位置」是否恰當，也值得進一步的討論。

邱貴芬主張借用「諧擬」(mimicry)與「混雜」(hybridity)的觀點來理解台灣文化。她以「台灣國語」為例指出「台灣性」其實就是「跨語文」，而台灣文化就是「跨文化」。廖朝陽則形容這種混雜論是「四不像」或「虎豹獅象」。他認為邱貴芬所提倡的「諧擬」(廖譯為「學舌」)只會造成弱勢者「被同化」。他主張，我們必須探問，「『台灣國語』的複化現象(hybridity)的性質是什麼？」(廖朝陽 1992：49)回應此一批判，邱貴芬(1992b)進一步引用巴巴的殖民的含混(colonial ambivalence)和雜交(hybridization)，並提出文化綜攝(cultural syncretism)的提議。¹她強調「文化融合」乃是後殖民論述的一個關注點。(邱貴芬 1992b：33)她批判廖朝陽的二元對立論，指出：

廖朝陽引用西方理論，認為「以文化異質為貴」的主張其實是新殖民力量化解內部與外部抗爭手段，恐怕是忽略了各個被殖民國家歷史背景和政治情況的特異性。(邱貴芬 1992b：38)

然而，此處「西方理論」所指為何？是廖朝陽批判的「某些後現代派系」嗎？那麼，巴巴算不算「西方理論」？確實，文化究竟應以何為貴，乃是一個錯綜複雜而無法以二元對立來思考的問題，無論是「西方/非西方」、「殖民/被殖民」或「異質/同質」的對立。

在邱貴芬以及其他探討台灣殖民經驗的文章裡，「土地」、「人民」和「語言」，三者之間往往具有某種未被言明的換喻關係

1 邱貴芬原文中直接用英文表示這些詞彙/概念，並未翻譯成中文。

(metonymic relation)。換言之，當我們在談「台灣的被殖民經驗」時，通常不會言明，「台灣」指的是這個地方、住在這裡的人民，還是他們的語言文化？通常三者皆有，但這三者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時而相合，時而矛盾，時而衝撞。在廖朝陽的文中，至少在這個階段，我們比較清楚看到「地方」和「主體性」之間的重疊交會，甚至不可任意分割的有機關係：

某些後現代派系所大力鼓吹的新人類很接近這種跨物種的四不像。也就是說，照他們的解說，「以異質為貴」就是做國際遊民，到處流浪(當然不是真的本錢那麼厚，只是精神上用想的)，吸收各種異類的性質，將本身變成破糊糊的「雜種」主體(其實每真純)。……若是要就拼貼的立場來處理這個問題，我想「以異類為貴」應該是一個比較適當的說法。以異質為論述的主要層次，加減已經假設，必須將類切割作質，否定了類這個層次的完整主體。以異類為貴則加減有以整個物種的主體為尊重對象，避免賭強另外作分割的意思。(廖朝陽 1992: 55)

在此，我們看到一個有機體的比喻，以「類」為層次的主體概念，將文化整體視為不能恣意分割的「物種」。「以異質為貴」和「以異類為貴」之間的差別，就在於後者尊重「他類」，一個有著整全界線的他者。

廖朝陽對於浪漫化的「國際遊民」形象的批判，隱約點出了地方和主體之間的有機關連，雖然並未詳加探討。誠如威爾森(Rob Wilson, 2003)所指出，在美國學院的文化研究領域裡，流離的論述(diaspora discourse)、邊界的典範(borderlands paradigms)以及換置(displacement)已經逐漸成為規範性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之下，確實可能發生一種浪漫化的迷思，忽略不同型態的流離，或換置情境中所涉及的權力問題與物質情境。台灣學界無可諱言深受美國的影響，此一學院體制的情境也不容小覷。廖朝陽以「大調」、「小調」的差異文化立場來說明此種權力問題。他指出，對於強勢者來說，熔爐(melting pot)模式固然可以「自體複化，雜入異質」(廖朝陽 1992: 57)，對於小調的弱勢文化者來說，拼貼(mosaic)模式才有可能保存自體。我認為，關於「自體」的可能性非常值得深究，我將在底下第三小節中進一步討論。

2. 雙重闡連：「人」的符號鬥爭

在此，我們不妨先從巴巴所強調的「雙重闡連」(double articulation)來重新整理上述辯論。在〈論擬仿與人：殖民論述的曖昧〉(On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中，巴巴說：

擬仿(mimicry)重新闡連了此在(presence)，以其所拒絕承認的「他性」(otherness)。(Bhabha 1994: 132)

也就是說，mimicry並不只是關於自戀與認同的問題，不是關於「誰」單向在仿效「誰」的。它所揭露的是權威的自戀，以及「人」這個虛擬整體的裂縫。更重要的是，面具的背後並沒有本質，但這並不表示當我們擺脫了片面的殖民依賴，就可以完全隨意地表演與建構。毋寧說，殖民客體的再現永遠都是部分的再現、部分的承認(partial representation/recognition)，這種部分性同時造成了一種雙重視影(double vision)的效果，藉以揭發殖民者主人論述的不完整，及其宣稱完整的荒謬性。

倘若忽略了此一雙重闡連的曖昧性空間及其鬥爭意義，就不免落入「同化」與否的二分法爭議。然而，「同」與「異」的對立早已無法適切思考「文化」的問題。(Bhabha 1994: 126)我們必須從鬥爭與生存的觀點去看待「人」的可能性。這底下最深層的乃是要成為人的欲望。換言之，「人」這個符號及其意義的爭奪才是擬仿和混雜的核心。

就像弗斯在分析法農時所言，傳統的心理分析傾向於主張「模仿」會造成「攝入」(incorporation)，乃至於「認同」(identification)，法農深切關注殖民歷史的作品卻指出，模仿的結果很可能反而是拒絕該項認同。(Fuss 1994: 25)更重要的是，在接受或拒絕之間，還有一個包含太多可能性的空間。我們有必要考慮種種混雜的可能性，感受差異的多重、複雜與缺乏秩序，才能跳脫同與異的二元架構，進入更細微的多重存在的裂溝。正如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所言，字詞的鬥爭並不是文字遊戲，也沒有任何具體的指涉，而涉及論述編織的戰鬥性。(Althusser 1971 [1969]: 21)換言之，關於「優位意符」的論述選

擇、闡連與競爭。殖民者雖然掌握「身為人」的特權，但不得不立足於裂縫百出的隱喻論述。被殖民者永遠「不夠適切」的「模仿」，不僅揭露了刻板印象的僵固和殖民者「人性」的裂縫，更暴露了「人」這個符號本身的不適切與不完整。換言之，殖民者原本被假定的完整與正統註定不斷在此一過程中墮陷，隨時可能掉入符象的黑洞。如此，在揭露中也提示了鬥爭的實踐取向。

3. 空的境地與立根處

在兩年後的一篇文章〈觀看、認同、模擬：從《香蕉天堂》看電影機器〉中，廖朝陽(1994)再度處理了「自體」和「他體」（對體）之間的複化或化入問題，也首度提出「空」的概念雛型來闡述台灣的主體性。這篇文章的主要理論資源表面上看似拉岡(Jacques Lacan)，但仔細閱讀，就會發現更核心的角色很可能是日本京都學派哲學家西谷啓治(Keiji Nishitani)。廖朝陽寫道：

如果我們可以隨意移動主體位置，按拉康的說法，我們就可以重劃真實與想像的分界，也就是說，只要找到適當的主體位置，我們就可以把所有真實劃為想像，或是把所有想像劃為真實。……西谷啓治的「回互關係」所要建立的，正是這樣的一種主體位置：「人自身的立根處有萬物，萬物的立根處也有人自身」……回互關係「並不是主客合一」……：一件東西化入其他東西的立根處，並不妨礙它站在本身的立根處。……在回互關係裡，主體認同、化入對體，同時也可以保有獨立自存的個體，而且也只有保有一個獨立自存的個體，主體才有真正認同、化入對體的可能。這就是所謂「空的境地」，也是想像認同的終極意義。當欠缺轉為空，想像趨近真實，優位接近低位，欠缺與完滿也就沒有差別。（廖朝陽 1994：147-148）

在上述引文中，廖朝陽嘗試結合三個不同概念：「主體位置」、「想像認同」和「空的境地」(standpoint of sūnyatā [emptiness])。有趣的是，廖朝陽一方面凸顯如果我們可以隨意移動的「主體位置」，另一方面，「主體」能隨意移動的似乎僅止於「位置」，亦即符號層次上的置位(positioning)，方能存其**獨立自存的個體**，以便化入對體。一方面，這是「空的境地」，另一方面，也保有個體不變的「立根處」。如此呈現出「空」與「實」之間的張力。唯一可以解決這種對

立的，似乎只有「想像認同」的動態操作。

在這篇文章裡，廖朝陽尚未提出「空白主體」，而只有「空的立場」。關於「主體位置」的心理分析概念，重點在於主體究竟具有多大的能力可以隨意移動他的位置，並且重劃「想像」與「真實」之間的分界。或許就像紀傑克所指出的，這種改變位置的「選擇」本身乃是在「幻見」的層次上進行，主要遮蓋了主體的分裂狀態。(Žižek 1999b: 92)但「幻見」並不是對立於現實的想像產物，而是讓我們得以碰觸現實的一小片想像物。因此，紀傑克強調，「穿越幻見」(traversing the fantasy)並不是要掃除幻想而認清現實，反而要更深切認同我們的想像領域，掙脫那些同質化的幻見框架，進入尚未被馴化的想像力，發現並面對我們內在的混亂與不一致。²(Žižek 1999b: 122)以幻見框架的觀點來說，「主體位置」的紛雜多樣其實是幻見所創造出來的，讓主體可以在其中自由漂移，轉換他的認同。而這些主體位置完全不同於空缺主體或主體的空缺。(Žižek 1999b: 92)換言之，以紀傑克和（至少根據紀傑克所詮釋）拉岡的心理分析而言，想像認同中所移動的主體位置不宜混同成一種社會關係意義的主體位置。有時候，這種移動與其說是抵抗，不如說是另一種馴服。

實際上，廖朝陽本人後來在其他論述脈絡中也引用紀傑克來強調這點：

就Žižek來說的話，笛卡爾式主體跟Lacan的主體是有密切關係的，就是說Lacanian主體並不是取消笛卡爾主體，而是笛卡爾主體的徹底化、根本化，假使是從這出發的話，跟subject position的講法是有一點互斥的，也就是這個Lacanian主體反而是比較反對subject position的講法。（廖朝陽 2001）

在這段引文中，廖朝陽所指出拉岡反對的「主體位置」說法顯然是較為社會學式的，有別先前所言的心理分析詞彙。無論如何，在1994年的這篇文章裡，廖朝陽所闡述的「空的立場」，儘管強調了比

2 在稍後將討論的，十多年前廖朝陽和廖成浩的相關辯論裡，他則把「穿越幻見」譯為「親證幻見」，並採用另一種英文說法「go through the fantasy」。

較講究動態構成的心理分析觀點，但確實容易引發讀者誤解（儘管很可能偏離作者本意），以為它實質上接近於邱貴芬在1992年所援用的社會文化意義的「主體位置」或「主體說話位置」，一種可以相當程度自由選擇的，徹底非本質論的立場。而那恰好是廖朝陽當時強烈批判的。

在此，為了進一步加以釐清這兩種「主體位置」的差異甚或對立，我們可以回到拉岡的文本稍作探討。在1954年2月的講座中，拉岡運用了著名的「倒轉花束的實驗」(experiment of the inverted bouquet)，然後在談論「眼睛」如同主體的符象，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並非一隻眼睛時，他說道：

這表示，在想像界和真實界的關係裡，以及從中形成的世界的構造裡，一切都仰賴主體的位置(the position of the subject)。而主體的位置——你應該知道，我早已不斷重申——本質上乃是被描繪為它在符象世界中所在的地方，換言之，它在言說世界中所在的地方。(Lacan 1991: 80)

位置，你所在的地方；但這不是一個絕對的地方，而是相對構成的網絡。這份關係乃是介於物體（花束）及其鏡中影像之間的關係，亦即，真實的客體和意象的客體。無疑，這是一個視覺的隱喻。就像主體所見其實並不是僅取決他本身所站的絕對位置，而是由他和客體、鏡子之間的**相關位置**來決定。換言之，心理分析所言的主體位置早已涉及想像認同和符象位置之間的張力，不宜化約到社會文化意義的主體所在或置位(subject placing or positioning)。

再說到「空的境地」，某方面固然可以說是「空」與「實」之間的矛盾衝突，但更貼近於空與實的本體合一。西谷啓治所說的sūnyatā乃是存有論的景況：

唯有和空無合一，存有方能是存有。唯有在空的場域(the field of emptiness)上，一切事物方能站在其自身的立根處(home-ground)，在此它處於自身的如是(its own suchness)中。……我們的自我本身大多本質上是「中間的」。它抵抗任何的解釋，因為它乃是一個和空無合一的存有。(Nishitani 1982: 124, 125)

嚴格說起來，這種在虛空中的存有論景況並不是關於「位置」

的移動或轉換，而是關於「力的場域」(field of force) (Nishitani 1982: 150)。此處是單數的力，因為世界的力乃是展現在世界裡的一切與其他事物的力當中。此一「力的場域」卻也正是「空的場域」(field of sūnyatā)。在空的場域中，我們都已經「於身為自我中並非身為自我」(not being self in being self)(Nishitani 1982: 158)。這種永遠的中間存在景況無法被化約到主客的二元架構。唯有在這個空的場域，此一「回互關係」(circuminsessional relationships)的場域裡，每個事物才可能同時在一切其他事物的立根處，且不離自身的立根處。

換言之，sūnyatā的「空」既不是空無一物，也不是存有的否定。我們在存有論上與空無的合一景況既不宜被化約到「形式」與「實體」之間的對立，也很難以心理分析的想像認同轉移來充分說明。至少，兩者之間的理論扣連尚且留有相當大的闡述空間。更重要的是，立根處的宗教存有論恐怕也道出了「自體」完整性的幻覺。不過，西谷啓治所闡述的「空的場域」儘管無法和心理分析的「空缺」混為一談，但都指向了「空」做為主體之所以可能的前提。顯然「空」這個意符本身包含了許多詮釋的可能性。如何看待「空」的多重含意，以及「空」與「移動」之間的動態關係，因此是我們探討主體性構成的一個關鍵問題。

(二) 空缺主體的裂溝

一直到《中外文學》1995年與1996年間的後殖民論辯，廖朝陽(1995a, 1995b, 1995c, 1995d, 1996a, 1996b)才確實提出了「空白主體」的概念，並和廖咸浩(1995a, 1995b, 1996a, 1996b)展開相關的辯論。很可惜辯論不歡而散，討論並未持續。關於「主體」內涵或形式的爭論始終沒能更進一步探問「主體性」和「主體化」的動態。

1. 「空白」和「位置」

廖朝陽在批判陳昭瑛以中國為中心的台灣史觀時，提出了「空白主體」(廖朝陽 1995a: 117)的概念。他大量倚重拉克勞的政治主體觀以及紀傑克的符象抵抗觀點，一反1994年文中引用艾略特(Anthony Elliot)和杜斯(Peter Dews)等論者來批判紀傑克把想像視為符象的愧

備。(143)基本上，廖朝陽這篇文章運用了兩方面的思想資源，一是女性主義的認同建構論(105, 113-114)，一是紀傑克所詮釋的拉岡主體觀。廖朝陽批判大中國主義的文化絕對論以「同文同種」的說法來抹殺台灣主體的選擇。他主張，民族認同原本就是一種「文化建構論」(115)，血緣也是一種文化建構(107)，並認為在這點上，獨派比較開放。而台灣三四百年來讀中文書的統派思維陷入了「文化實質決定論」(121)，形同一種「中國文化的絕對道德命令」(112, 117)。堅定的反實體化立場以及近乎反向本質化的絕對建構論立場充分表現在廖朝陽對「空白主體」的闡釋。

首先，我想進一步探討廖朝陽所挪用的女性主義理論。廖朝陽引用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話指出「性別特質(sexuality)是既存權力關係之中的文化建構」(113)，引用蓋洛普(Jane Gallop)指出我們必須「不斷接納認同，並立即加以質疑」，並引用弗斯強調我們必須「論述各種本質性的束縛，在其中尋找發言位置」(113)。他認為，這些立場直接肯定了文化建構論的意義。更重要的是，文化建構論時常以「主體位置」取代主體，以便強調主體只是特定時空下文化建構的產物。(113)因此他同意顧燕翎所言，國家認同不如改稱男性論述(115)，儘管他並未深究國家認同的男性特質為何。儘管他強調，建構並不是絕對的解構或像換穿衣服般隨意，而是關於某個「主體」在整體空間裡的位置(114)。至於這個整體空間是什麼，無非就是歷史社會的脈絡，而那能夠變換位置的主體，也將我們拉回到他幾年前所談論過的「自體」。然而，從「自體」到「主體」，似乎成了一個不斷抽換內容物的過程。

關於女性主義對認同的看法以及「文化建構論」之間的相通，有必要進一步加以釐清。巴特勒本身對建構論是有所批判的，尤其是對極端建構論中隱含的自然 / 文化二分法。(Butler 1990, 1993)在與紀傑克和拉克勞等人討論偶成性與普遍性的問題時(Butler, Laclau and Žižek 2000)，巴特勒批判那些獨尊「結構」而漠視「建構」的取徑，她所強調的關鍵問題在於：我們該如何理解「可闡連性的場域」(the field of articulability)。這樣的場域既是結構的，也是歷史的。換言之，她

並沒有完全否定結構的向度，但她極力主張，我們必須同時考慮這些可闡連性的歷史可能性。(Butler et al. 2000: 13)而蓋洛普的「建構」始終不可能離開身體。因為，身體並非被動的材料，同時必然充盈著隱喻。比如，她指出，伊瑞葛來所談的「陰唇」並不是生物學意義的陰唇，而是身體的建構與創造。(Gallop 1983)然而，此一建構的意含不宜理解為單向度的「文化」建構了「身體」（自然）。反之，身體隨時參與著自身的建構，而具有一種「無可避免的隱喻性」(inescapable metaphoricity)(Gallop 1982)。弗斯則強調一種「雙重姿態」(double gesture)——我們必須去理論化自己從中發言的「本質主義空間」(to theorize essentialist spaces from which to speak)，但也必須同時去解構這些空間，免得它們僵固硬化。這種雙重姿態，必然涉及「去進行歷史化的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historicize)(Fuss 1989: 118)。弗斯的目的是和紀傑克、巴特勒等人類似，都在於拆解「建構」和「本質」的對立，強調任何激進的建構論必然建立在某種隱藏的本質主義。(Fuss 1989: 12)弗斯指出，倘若沒有任何本質主義的空間，也就沒有發言的可能，也因此，我們必須更有自覺地去釐清這個通常被視為理當然的發言空間，那是一種透過不斷重覆而由偶然變成必然的物質脈絡，一個暫時被定格下來的整體性，無論我們名之為「歷史」、「文化」、「理性」或「人性」。

對於這些論述上的曲折迂迴，廖朝陽當然是有所知曉的。然而，在闡述「空白主體」的概念時，他的論述策略乃是從以「文化建構論」抵抗「文化實質論」的基本思路出發：

主體的概念通常是以自由（自主、自律）為基礎。但是真正的自由不能含有實體內容，因為內容來自獨立存在的實體。有內容也就表示自由在特殊性的層次受到具體條件的限制(Laclau and Zac 1994: 11f)。第二，主體並不是虛無，主體空白也不是「主體的死亡」。自由超越實質內容，但是必須依附有實質內容的具體秩序才能進入理性的層次，發展創造、生發的可能(11f)……正因為本身沒有內容，所以空白必須靠內容來完成本身容納創造的本質；也就是，主體必須不斷移入內容來建立或印證本身移除內容的可能。這就是它的絕對性所在。……主體的空白也就相當於心理分析所講的「欠缺」(lack)。(廖朝陽 1995a: 119)

上述引文運用了拉克勞和札克(Lilian Zac)的〈留心裂溝：政治的主體〉(Minding the Gap: The Subject of Politics)。雖然明白觸及了自由與內容之間的辯證，卻令人納悶地隻字未提拉克勞和札克相當關心的「政治認同的多重決定(overdetermination)」(Laclau and Zac 1994: 17)。從而也就不免忽略，在認同的運作過程中，主體和客體這兩端之間具有終極的不可相容性(ultimate incompatibility)(14)，以及一切主體的再現在構成上必然呈現出的不恰當與失敗(16)，亦即拉克勞和札克所謂的「構造上的不可共量性」(a constitutive incommensurability)(15, 16)。主體得以持續的基礎正在於我們必須持續不斷地去再生產這種不恰當性，在不恰當之中一次又一次地再現出主體。

或許爲了論述的目的，廖朝陽省略了上述複雜的論述過程，傾向強調「空白」和「內容」之間的對立，以及「移入」和「移出」的雙向運動。在這樣的詮釋中，「空白主體」的空白性成爲一個可以移出與移出內容的「形式」。換言之，原本包含複雜動態心理分析意涵的「匱缺主體」(the subject of lack)或「空缺主體」(the subject qua void)，無可避免被壓縮，扁平化爲一個等待或主動尋求內容填補的空白形式。但也唯有透過這樣的論述策略，才可能輕易在理論上把「空白主體」扣連到「主體位置」，跳過兩者之間的諸多矛盾。

比如，巴特勒、拉克勞和紀傑克分別對主體的看法其實有很多衝突。(Butler et al. 2000)關於「主體位置」的詮釋，文化社會學的觀點和心理分析的觀點也不盡相同。正如上一小節所指出的，拉岡的心理分析並不贊同「主體位置」的看法。所謂「空缺主體」或空缺做爲主體本身，根本的問題意識在於質疑主體化和主體之間的線性關係，並試圖面對那永遠無法完全符象化、無法被充分再現的「主體化之前的主體」(Žižek 1999a: 258-259; 粗體是我的強調)。

然而，廖朝陽在闡述「空白」的意義時引用紀傑克指出，在文化建構的過程中，真正的先驗主體只能是沒有實際內容的空白。因爲沒有實質內容，此一空白不能以「命令」的方式來規範理性層次的思考。(廖朝陽 1995a: 118)耐人尋味的是，這樣論述的效果卻是建立

了「命令」和「意願」之間的二元對立。這些二元對立的不斷換置，避開了「空缺主體」中的迂迴動態，而正是這種動態足以打亂主體化和主體之間的線性關係。因為，在空缺主體之後發生的主體化主要是把主體（或空缺）置回符象化的秩序中，而不是用符象的內容來填補空缺。

順著廖朝陽所建立的幾組對立：實質vs.建構、內容vs.形式、命令vs.意願，不難想見他的辯論者會從哪些點去進行質疑。廖咸浩在回應廖朝陽的文章〈超越國族：為什麼要談認同？〉中質疑了徹底的反本質立場，轉而尋找建構的「基礎」。有趣的是，就像1992年廖朝陽在質疑邱貴芬的「台灣性＝跨文化性」說法時所強調的「自體」或「立根處」，1995年的廖咸浩也試圖從「基礎」去拆解建構論本身未經檢驗的預設。由於雙方的辯論點很多，並各自運用了一些值得深究的喻說，以下討論將跳脫線性的時序，改以論述線索來重組呈現。

2. 分裂的紀傑克

廖咸浩指出廖朝陽在引述紀傑克時完全忽略他認為更重要的「天生內在衝突論」，並誤把國家或民族比喻成「人」。（廖咸浩 1995a：71）國族主體的建構乃是基於紛雜而多元衝突的物質基礎，並不像廖朝陽所言可以輕易「移入」或「移出」。廖咸浩也試圖提出「階級」的面向，以便強調族群對立的偏狹。（廖咸浩 1995a：74）

在你來我往的辯論過程中，廖咸浩質疑「『空白』能幾多？」（廖咸浩 1996b：156），並指出，廖朝陽只強調紀傑克所說的「親證幻見」（go through [the] fantasy），卻完全避談「享受病徵」（enjoy your symptom）（廖咸浩 1996b：157），但兩者不可偏廢。

「親證幻見」凸出主體性的建構本質，「享受病徵」則承認「歷史」對主體深沉的影響（否則，哪有什麼認同的問題好談？）。用拉崗的話來說就是，人是「病癥合成人」（le sinthome），本質上雖是空白，卻不可能完全回到空白，因為人是歷史的動物。有歷史，也就有「感情」。歷史／感情可以用理性來理解，卻不可能一筆鉤銷。廖對空白主體的理解把歷史的部份全然忽略，才会有主體性像臭水要倒掉就倒掉的說法，才有可能談「不涉感情的」實效。（廖咸浩 1996b：157）

廖朝陽在回應中主要針對「感情」之說提出質疑。認為這些情感之間充滿了矛盾與衝突。情感若是一種症狀，在享受與親歷穿越之間，也絕對無法截然劃分。

確實如此，但兩者之間的曖昧空間就像符象域和想像域之間的分界與扣連，有待更深入的思考。如同上文所指出的，根據紀傑克之見，穿越幻見並不是認清現實或進行文化的建構，而是更深刻地回返前符象的想像空間。而享受病徵也不只是歷史的影響，而涉及現代社會的集體超我，一種允許溢出常軌的超我命令，例如種族屠殺的惡行。也因此，紀傑克強調，任何一種昇華都同時涉及了某種產生病態症狀的壓抑。「病癥合成」(le sinthome)的概念則比症狀更徹底，深入到**個體的存在獨特性之內**。因此，既無法穿越也無從詮釋，只能加以認同。(Žižek 1991: 137)根據紀傑克的詮釋，這是拉岡心理分析有別於一般想把我們變成「正常人」的心理醫療。找出你存在的終極基礎之後，一個人只能認同她最深的病態獨特性，臣服於她最真切的欲望。在「穿越幻見」和「享受病徵」之間，並沒有一條明晰的道路。

兩廖的辯論徹底避開了這方面的探討。廖咸浩所強調的是感情投射與利益考量(廖咸浩 1995a: 73)，而廖朝陽強調的是國家構成的「意願」成分(廖朝陽 1995a: 115; 1996a)。以雙方不約而同引用的紀傑克來說，廖朝陽強調紀傑克所言，裂溝本身就是主體的「空白主體」概念，而廖咸浩強調紀傑克對單一國族主體(以及「生命共同體」)的徵狀式批判。但兩位都並未以心理分析的徵狀式閱讀去探索台灣現代性的歷史內涵，而或多或少停留在統獨的框架之內。³兩廖的激辯從1995年延續到1996年，其中觸及許多重要議題，包括本土主義和國族主義的陷阱，尤其是「文化主體」構成的紛雜動態線索，但最後仍不免在爭：是「獨派」還是「統派」比較能夠開放看待「台灣主體性」的構成問題？因此，很遺憾地，未能更深入探索此一主體性編織的可能性空間。

3 劉紀蕙(2004)則廣泛援用了心理分析的徵狀式閱讀來檢視台灣的歷史意識與文化表徵。

儘管兩者對於紀傑克的援用各執一詞，但廖咸浩並未質疑廖朝陽對於「空白主體」的詮釋。辯論後來膠著於「空白」的可能性，比如杯子和杯中水的比喻，始終不脫廖朝陽一開始劃定的「形式」與「內容」的對立。然而，「空白主體」這個未經拆解的概念，很可能正是兩廖辯論為我們留下最核心的議題。因此，以下我想進一步在理論上加以探討。

3. 空白、欠缺、或裂溝：主體的潰散與縫合

關於「空白主體」的概念，無疑必然涉及字詞的翻譯和意義的詮釋。而翻譯，不僅關乎文字的理解與運用，更涉及論述的策略。上述討論已經指出，在當時的論爭脈絡裡，廖朝陽所提出的「空白主體」確實達到一定的作用。

回到拉岡心理分析的脈絡，基本上，「subject qua void」與其說是文化建構的，更精確來說是指文化性的主體化過程之前的「主體」，那和母體(matrix)之間撕開後所造成的裂溝(gap)；這個裂溝本身就是主體的可能性。那是一種「特定的裂溝或空缺，為了身為那『是』主體本身之物」(a certain gap or void in the order of being which “is” the subject itself)(Žižek 1999a: 288-289)。因此，「空白」一詞很可能過於平板，難以充份凸顯「void」與「gap」的時空厚度與立體感。基於這些考量，我選擇把「subject qua void」翻譯並詮釋為「空缺主體」。倘若空缺就是主體本身，空缺的發生就是一個「原初」的主體化過程。這是和母體撕裂的過程——母體，可以是真實的母親，可以是文化規範的母體，可以是存有論的實體，也可以是無以名之的真實界。就像紀傑克強調的：「主體因此和主體化的效應是嚴格對立的：主體化所掩蓋的並非一個前主體的、或超主體的書寫過程，而是一個結構中的匱缺，一個其實正是主體的匱缺。」(Žižek 1989: 175)

再以紀傑克對康德式主體的闡述為例，這種看似外在的撕裂在另一個層次的主體化過程中被轉化為主體內在的分裂。比如，在我身為判斷主體的能力中，透過指認出自己在宇宙和諧結構中的位置，我將自己主體化。(Žižek 1993: 172)也就是說，不同於根本層次的撕裂，空

缺主體透過重新將自身置入存在與事物的序列中，建立起一個充盈主體的幻見，掩蓋住內在的分裂。也正是透過這種對事物秩序與規範的臣服，主體取得了所謂的主體性，一個必然的，不得不想要的幻見。就像紀傑克所強調的，即使我們揭露了幻象底下的機制，它仍然會持續運作下去。(Žižek, 1993: 172)然而，同時也必須強調，第二層意義的主體化過程永遠都無法充分，也因此永遠都必須被重覆，那並不是單向的臣服或不得已的選擇，而涉及主動與多重關連的勞動。正如拉克勞一再指出的，這是一個明知註定失敗卻只能不斷繼續進行的過程。因為，每一次「失敗」都是一個暫時定格的、具有政治意義的主體性。簡言之，上述兩個層次的主體化始終交混著存在，無法以線性的前後關係來明確界定。毋寧說，在重新置入存在序列的第二層主體化過程中，幻見同時掩蓋與召喚了根本層次上的主體化。⁴

「空缺主體」的概念乃是出自拉岡的心理分析與主體觀。正因為任何政治主體，包括上述論爭中所討論的台灣做為一個後殖民主體性的構成，都是根植於某種被撕裂所造成的匱缺，認同的運動必須持續不斷地進行並填補此一裂溝：

匱缺和結構之間的動態關係可以用拉岡理論的若干邏輯來說明：(1)縫合的邏輯；(2)壓抑的邏輯；(3)主體的邏輯。縫合的邏輯專注於匱缺（主體）和結構（客體）之間關係中張力最大的那個點（縫合點 [point of suture] ），亦即阻力最小的地方。這涉及意符的關連，這個意符在論述的環節底下流通，在行動上成為匱缺的「替補」(a stand-in)，從而宛如是結構的一個要素（比如，死亡、性）。(Laclau and Zac 1994: 33)

這個被找出來的「縫合點」，因此也是一個關連的節點(nodal point)。這些概念，不僅是對於拉岡的le point de capiton的「翻譯」，更是一種論述的闡述與延申。誠如紀傑克所指出的，le point de

4 拉克勞和紀傑克的觀點當然並非完全相同或相容的。比較起來，拉克勞更強調語言與結構化的運作邏輯，紀傑克則更強調邏輯底下無法抹去的幻見，因此必須持續揭露「權力的淫穢底面」(the obscene underside of power)。限於本文的篇幅與目的，無法在此做更細緻的分析，必須留待日後處理。

capiton在字面上的意思是「縫製點」(quilting point)，有時譯成「下錨點」(anchoring point)。(Žižek 1989: 87)此外，也經常被譯為「縫合點」(point of suture)。無論如何，以拉岡自己運用的例子來說，那宛如一個空間化的設置，一顆被縫在皮沙發上的扣子。這顆支撐的扣子形成了某種張力場域，把周邊原本渙散的力量或要素聚合在一起：

所有具體的話語分析都必須環繞著這一個所謂的「縫合點」去運作……倘若我們要像讀樂譜一般去分析此一場景（按：沙發修理工的針線活），就會發現，在這個點上，意指和意符被打結在一起，兩者之間充滿仍在流動的意義眾量(floating mass of meanings)，不斷流通在這兩個角色和文本之間……縫合點是恐懼(fear)這個字，帶著所有這些超出意義的言外之意。一切都從這裡散發出去的，並繞著這個意符聚合，就像一個裝襯的扣子在材料表面形成了眾多小小的張力線。正是這個聚合的點，讓此一論述中發生的一切都可以被回溯地與推斷地加以定位。(Lacan 1993: 267-268)

在這個充滿張力的縫合隱喻中，凸顯的並不是意志論的建構過程，而是要素之間的暫時相繫與持續張力。不同的翻譯選擇，並非僅是出自對該名詞的理解差異，更是出自從中衍生出來或意欲藉此開展的論述策略。比如，拉克勞所闡述的論述節點，乃是在強調一個結構化整體的可能性。就某方面來說，拉克勞比拉岡更強調此一接合點本身的構成必須透過闡連的實踐來達成。拉克勞所說的廣義論述性因此也是一種社會實踐的文本性（編織性），它所強調的是打結之前或鬆結之後的紛雜狀態。

一個更貼切台灣後殖民論述的例子可能是現代國族(nation)論述的持續「縫合」與「拆掉縫合」。就像紀傑克所指出的：

唯有縫合本身，才能夠確實讓自身拆掉縫合。

現代意義的國族一方面促成了新的縫合，讓符象意義的抽象公民成為構組現代國家的主體，另一方面也促成現代國族去脫離傳統意義的有機連帶，也就是與之「拆掉縫合」。然而，這樣的「拆掉縫合」也不可能是徹底脫勾，總帶著幾分「真實域」的剩餘，必須訴諸某種偶成的物質性，所謂「共同的根」、血緣或土地。(Žižek 2002: 20)

換言之，符象意義和有機連帶——亦即文化建構和物質性——之

間並不是二選一的關係，而是在多重縫合的過程中互相推擠，多重決定的並存競爭。「縫合」並不是單一整全甚或全體化的過程，而是紛雜線索中多重的闡連與編織。「拆掉縫合」也不是回復到「空白」，因為透過不斷重覆而從偶然變成近乎必然的物質性不會瞬間消失，而早已沉澱在歷史的底層，或成爲一個創傷的硬核。在台灣的後殖民論述場域中，至少以本文重探的若干討論來說，各方論者似乎比較強調單向的縫合，而非多向的編織，比較專注二元的分裂，而非多重交疊的紛雜。

回到拉岡心理分析所提出的「空缺主體」。就像先前指出的，拉岡所說的主體乃是一個最初的空洞或匱乏，超越了歷史文化與社會，但不同的社會環境也構成了不同的文化母體。這種和母體之間必然的撕裂狀態並非任何特定「主體化」過程的產物，而毋寧是一種「主體化之前的主體」，一個空缺或裂溝所造成的主體性本身。然而，此一「最初」情境往往也在廣義政治場域中的認同運動中不斷重現與再生。也因此抵抗才可能是符象的，而不只是想像域的認同。主體試圖在一個意義化的再現中闡述與扣連自身的存在，但這樣的再現，是必然失敗的或不恰當的。或是像巴巴所言，這種不恰當性的揭露，正是一種對殖民論述的抵抗。(Bhabha 1994: 126)如果說「再現」的意義必須是「精確」或「忠實」的，那麼「社會」和/或「主體」就永遠無法充分被再現。而紀傑克提醒我們，就連這份「不可能」也是無法被充分闡連的。這樣的否定性，內在的分裂矛盾，都只能透過某種「扭曲」的方式與樣貌讓我們感知與思考。或許應該說，正因為扭曲的必要，主體性做爲一個多重闡連的場所才成爲可能，我們也才能在幻見之外，進行字詞的鬥爭以及符象的抵抗。

四、小結：台灣的「陰性情境」和「空缺主體」

本文的討論指出，在台灣的後殖民論述場域中，台灣無論做爲一塊土地、一個地方，或一個大寫的主體，都在論述上被賦予一種陰性特質——被撕裂的故土、新故鄉的母親、被強姦的女人、新嫁的婦

人、孕育新國族的母親。如果說台灣後殖民論述場域中有一個始終沒有被徹底置換掉的優勢意符，那恐怕就是「性」(Sexuality)。各方論者總是不時透過性化的比喻去建構或編織台灣這個地方的陰性特質。

但我更想強調的是，這種論述上的接合並不只是符象層次上的編織，更透露深層被避而不談的流動基質與陰性經驗，借用伊瑞葛來的話來說，就是一種文化論述中不被討論的「子宮經驗」(Irigaray 1993: 16, 33)。或許那也涉及拉岡所言，想像域和真實域之間的界線流動。以一個後殖民的脈絡來說，我們可以說那涉及了台灣在展現出「對現代性的欲望」以及正式進入或被推入「世界歷史」之前/之際的幽暗底質。

不同於固置化的陰性特質，這種主體性空間的陰性情境不必然是物化與受困的，而毋寧在異化與重返的曖昧性裡儲備並展現不斷闡述與抵抗的動能。我們所必然身處的情境（身體、土地、文化母體），同時也正是讓行動力得以活動與彰顯的空間。其陰性的特質因此更像是一種流動的液態基質，而不是在空氣裡飄浮的意符。因此，與其說台灣具有某些「陰性特質」，或許不如說，台灣被持續體驗為一種「陰性情境」。我們所觀察到的陰性特質都具有生動的論述動態與多重性格，但同時展現出深沉甚或受困的情境性。於是，在符象層次的流動編織，以及生存與肉身情境的沉重濃稠，兩者之間有著永難消解的張力。正是這樣的張力，讓我們得以鮮活綻放。

就像本文透過身體現象學的取向進一步所指出的，土地與女體所共同體現的，乃是主體性空間之所以可能與受限的陰性情境。這是透過許多喻說操作而形構，這些喻說充滿了陰性化的風格與內容。在這些喻說過程之中，土地/身體並非被動的材料，而是實際參與了自身的建構。本文所討論的諸多相關文本體現了台灣做為一塊有著土地的地方所身處的陰性情境——她身為海島的屬性、她特殊的物質性、她的歷史文化基質、她的被殖民、去殖民、新殖民與後殖民情境，她的妾身不明，她被爭奪與占有的命運，以及她試圖掙脫與迂迴抵抗的逃逸性格。以一個活在特定土地上的個體來說，她身為/成為一個「主體性」的可能性和她所棲居的身體與土地息息相關。這牽涉到她的身

體情境、身體能夠帶她前往的地方、這塊土地透過諸多叢結引領她延展的身體，乃至於她在這塊土地上透過多重社會關係所能闡連出來的地方感，以及主體可能性的空間。這因此也是關於主體、身體、地方與空間的多重闡連。並涉及我所強調的至少三重情境性之間的闡連：身爲一個情境(a situation)、處於特定的情境(situated)，以及具有修改外在處境的能力(situating)。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闡連」並不僅是狹義論述意義上的，更隨時涉及欲望的生成與拆解，以及肉身的交織與演化。如此也召喚出一種跨科系的闡連觀點，以期跳出狹義的語言世界，進而觸及身體和語言之間的交織。正如我在第二節第二小節討論所指出的，梅洛龐蒂身體現象學所說的「肉身」，跨越物質和精神的二分法，指向了存有的「要素」；因爲，世界的肉身，和「我」的肉身，都是附著在「所在地」與「此時」。(Merleau-Ponty 1968: 145)

在本文的論述重探中，我試圖指出，「位置」和「意符」具有某些關鍵的相似處；在建構與換置的過程，兩者都無法徹底脫離身體、基質、母體，亦即陰性情境。如此也迂迴地回答了本文的核心問題意識之一：「如何在認知到相對性、建構性與偶成性的同時，仍然可以深入探討物質的力量與政治的可能性？」這種交纏的關係，並不是單向度的情境決定論。因爲，這些物質性並不是傳統人文主義者所想像的，相對於人類行動主體的死物，而總是早已參與在物質的建構與意義的商榷之中。因此，我們有必要在探討意義的漂移時，重新置入身體和情境性，並非做爲辯證的項目，而是**動態性地**導入流動的基質，去碰觸意義的肉身。

本文一再強調的主體化動態，正是「空缺主體」這個概念的關鍵所在。如果空缺本身就是主體，主體的可能性在於結構的裂縫，主體的多重闡連也就是對裂縫的不斷縫合，「主體」因此有如一條縫線，被縫合的傷口。後殖民的擬仿不僅是基於殖民情境的混種與主體界線的雜揉，同時也更深切地暴露或加深這種交混與雜揉。這是抵抗，也是傷痕，是在抵抗傷痕，也是抵抗的傷痕。或許，所有的抵抗都是一道又一道的傷痕。在縫上某一道傷痕的同時，必然撕裂另一個傷口。

在殖民歷史與經驗所造成的陰性情境的多重傷痕之中，後殖民主體性的肉身——而誠如梅洛龐蒂所言，那和「世界的肉身」是同樣的材料／要素所構成——也唯有在不斷縫合中，呼吸著空缺：

對自然進行一項精神分析吧：它是肉身，它是母親。
(Merleau-Ponty 1968: 267)

大地、自然、母親的隱喻同時代表一種**對符象化的抵抗與逃逸**，雖然這種抵抗似乎在論述上不得不借用某種符象化來呈現。後殖民問題意識中不斷想要進入、並挑戰、與拆解主流論述(dominant discourse)和主人論述(master discourse)的欲望，卻總是在召喚並體現著這些隱喻，不斷暴露或彰顯中心論述與抵中心論述必然的不完整與裂縫。

對於那難以言喻的陰性情境的碰觸與探討，無可避免要回到**欲望**的問題，那成為他者以便再度成為自己的欲望，那不能不去質疑自身欲望的欲望；這些欲望和符象化之間的關係同樣是曖昧、捕捉與逃逸的。換言之，這樣的欲望不僅表現在符象和語言的層次上，同時也流淌著逃脫符象化的欲求與渴望。在滿是分裂與匱缺並且建立在這些分裂與匱缺之上的主體性空間裡，唯一豐盈飽滿、交織著世界存有要素的肉身是欲求的、痛苦的、熱望的、退縮的、延展的、矛盾的、掙扎的與協商的，這些動態充分甚或過度地表現在當代後殖民「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的拉扯。在「台灣」的身體圖式中，有多少這樣的欲求在流動、充滿、折衝與碰撞？或許這是我們在不斷試圖「再現」台灣時，總是同時面對與迴避的問題。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Fanon, Frantz (弗朗茲·法農) 著，陳瑞樺譯。2005。《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台北：心靈工坊。

朱偉誠。1998。〈臺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論「現身」問題〉，收

錄於《台灣社會研究》第30期，頁35-62。

- 。2004。“The Topology of Homosexuality and Postcolonial/National Allegory”，收錄於《台大文史哲學報》第61期，頁391-427。
- 邱貴芬。1992a。〈「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收錄於《中外文學》第21卷第2期，頁151-168。
- 。1992b。〈「咱攏是台灣人」：答廖朝陽有關台灣後殖民論述問題〉，收錄於《中外文學》第21卷3期，頁29-47。
- 。1997。《仲介台灣：女人》。台北：元尊文化。
- 。2000。〈女性的「鄉土想像」：台灣當代鄉土女性小說初探〉，收錄於《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梅家玲編，頁119-143。台北：麥田。
- 陳光興。2006。《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
- 陳芳明。2002。《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出版社。
- 張京媛編。1995。《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
- 張小虹。1995。〈重塑法農：《黑皮膚，白面具》中的性別／種族政治〉，收錄於《中外文學》第24卷5期，頁39-57。
- 梅家玲編。2000。《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台北：麥田出版社。
- 梅家玲。2004。《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〇、九〇年代台灣小說論》。台北：麥田出版社。
- 馮品佳。2000。〈後殖民英文小說中的女性成長敘事〉，收錄於《幼獅文藝》第558期，頁76-84。
- 廖咸浩。1995a。〈超越國族：為什麼要談認同？〉，收錄於《中外文學》第24卷第4期，頁61-76。
- 。1995b。〈那麼，請愛你的敵人：與廖朝陽談「情」說「愛」〉，收錄於《中外文學》第24卷第7期，頁89-108。
- 。1996a。〈本來無民族，何處找敵人？：勉廖朝陽「不懼和解、無需民族」〉，收錄於《中外文學》第24卷第12期，頁143-155。
- 。1996b。〈狐狸與白狼：空白與血緣的迷思〉，收錄於《中外文

學》第25卷第5期，頁154-157。

- 廖朝陽。1992。〈是四不像，還是虎豹獅象？：再與邱貴芬談台灣文化〉，收錄於《中外文學》第21卷第3期，頁48-58。
- 。1994。〈觀看、認同、模擬：從《香蕉天堂》看電影機器〉，收錄於《中外文學》第23卷第6期，頁135-159。
- 。1995a。〈中國人的悲情：回應陳昭瑛並論文化建構與民族認同〉，收錄於《中外文學》第23卷第10期，頁102-126。
- 。1995b。〈再談空白主體〉，收錄於《中外文學》第23卷第12期，頁105-109。
- 。1995c。〈關於台灣的族群問題：回應廖咸浩〉，收錄於《中外文學》第24卷第5期，頁117-124。
- 。1995d。〈重述與開放：評巴特勒的《造就身體》〉，收錄於《中外文學》第24卷第7期，頁122-129。
- 。1996a。〈面對民族，安頓感情：尋找廖咸浩的敵人〉，收錄於《中外文學》第24卷第9期，頁96-106。
- 。1996b。〈閱讀對方〉，收錄於《中外文學》第25卷第1期，頁136-139。
- 劉紀蕙。2000。〈《中外文學》之本土轉向〉，收錄於《中外文學》第28卷第2期，頁17-21。
- 。2004。《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台北：麥田出版社。
- 劉亮雅。2006。《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台北：麥田出版社。

二、英文書目

- Althusser, Louis. 1971 [1969].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Press.
- Beauvoir, Simone de. 1948. *The Ethics of Ambiguity*. New York: Citadel Press.
- . 1989 [1949]. *The Second Sex*, translated by H. M. Parsh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Bhabh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 Butler, Judith,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Žižek. 2000.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 London: Verso.
- Fuss, Diana. 1989. *Essentially Speaking: Feminism, Nature and Difference*. New York: Routledge.
- . 1994. "Interior Colonies: Franza Fano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fication," in *Diacritics*, Vol. 24, No. 2/3, Critical Crossings (Summer-Autumn): 19-42.
- Gallop, Jane. 1982. "Writing and Sexual 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 Within," in *Critical Inquiry*, Vol. 8, No. 4 (Summer): 797-804.
- . 1983. "Quand nos lèvres s'écrivent: Irigaray's Body Politics," in *Romance Review* 74:1 (January): 77-83.
- Haraway, Donna. 1997.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FemaleMan_Meets_OncoMouse™: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 Heinämaa, Sara. 2003.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Sexual Difference: Husserl, Merleau-Ponty, Beauvoir*.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Irigaray, Luce. 1984. *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s*, translated by Carolyn Burke and Gillian C. Gill. Ithaca: Cornell Press.
- . 1993. *Sexes and Genealogies*, translated by Gillian C. Gi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ruks, Sonia. 2001. *Retrieving Experience: Subjectivity and Recognition in Feminist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can, Jacques. 1991.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edited by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lated by John Forrest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 1993. *The Psychoses, 1955-1956.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I*, edited by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lated by Russell Grigg.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Second Edition. London: Verso.

Laclau, Ernesto and Lilian Zac. 1994. "Minding the Gap: The Subject of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Identities*, edited by Ernesto Laclau, pp. 11-39. London: Verso.

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asil Blackwell.

Massey, Doreen. 1994.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in *Space, Place and Gender*, pp. 146-156. London: Polity Press.

Merleau-Ponty, Maurice. 196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lated by C. Smith.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64. *Signs*, translated by Richard C. McClear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68.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edited by C. Lefort, translated by A. Lingi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Nishitani, Keiji. 1982. *Religion and Nothing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lkowski, Dorothea and Gail Weiss eds. 2006.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Maurice Merleau-Ponty*.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Rich, Adrienne. 1984. "Notes towards a Politics of Location," in *Blood, Bread, and Poetry: Selected Prose, 1979-1985*, pp. 220-231. New York: Norton.

Rubin, Gayle. 1997[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The Second Wave: A Reader in Feminist Theory*, edited by Linda Nicholson, pp. 27-62. New York: Routledge.

Wilson, Rob. 2003. "Reframing Global/Local Poetics in the Post-Imperial Pacific: Mediations on 'Displacement,' Indigeneity, and Area Studies," in *Ariel* 34, No. 1: 53-75.

Žižek, Slavoj.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 1991. *Looking Awry*. Cambridge: MIT Press.

- . 1993.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 1996. "Fantasy as Political Category: A Lacanian Approach," in *Journal for the Psychoanalysis of Culture & Society* 1: 77-85.
- . 1999a.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 1999b. *The Žižek Reader*, edited by Elizabeth Wright and Edmond Wrigh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 2002.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 Second Edition. London: Verso.

三、網路資料

- 廖朝陽。2001。〈「呂秀蓮」抓狂：文化批判的方法論問題〉座談，文化批判論壇第一場，2001/02/24，紫藤廬。論壇實錄收錄於《文化研究月報》第一期。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forum_1.htm。（2008年3月2日瀏覽）